

# 名篇与选本

## ——以元和十大诗人被选诗为中心的定量分析

尚永亮, 洪迎华

**[摘要]** 对古今有代表性的 46 种唐诗选本所选元和十大诗人诗作予以统计, 厘定入选 10 次以上的 91 首诗作为名篇, 用定量分析等方法进行考察, 可得出以下结论: 就具体诗人名篇占有量而言, 刘禹锡名列榜首, 其下依次为白居易、柳宗元、韩愈、李贺、张籍、王建、贾岛、元稹、孟郊; 就名篇所用诗体而言, 七绝占绝对优势, 其下依次为七古、七律、五古、五律等。名篇的形成, 盖由诗歌表现力、感染力、篇幅、韵味和独特本事、名家推赏、重要选本选录等内外因素共同促成, 而与诗人之成就、地位倒未必尽属正比例关系。此外, 名篇对诗人来说也像一把双刃剑, 既可促进诗人声名之传播, 也会对诗人整体诗歌的传受形成负面影响。

**[关键词]** 唐诗选本; 名篇; 元和十大诗人; 定量分析

**[作者简介]** 尚永亮,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湖北 武汉 430072 洪迎华, 厦门大学中文系讲师, 文学博士, 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0)09-0088-07

中唐元和是与盛唐开元、北宋元祐并称“三元”的一个重要时期。此一时期诗歌创作领地大家辈出, 云蒸霞蔚, 其最著名者莫过于韩愈、孟郊、李贺、贾岛、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 故本文将其简称为“元和十大诗人”。

唐诗选本虽多, 但由于编纂者身份及编纂质量等因素, 导致其传播范围和传播强度上存在不小的差异。在几近千种的唐诗选本中, 真正具有较强传播功能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因而而这些选本值得我们特别重视。一般来说, 那些选录标准客观、目标读者群较大、版本众多、注释者众多、选诗数量适中的选本, 传播效果最好, 如著名的《千家诗》《唐诗别裁集》《唐诗三百首》等即是。

任何选本都会选择名篇, 而真正的名篇则是通过众多选本的选录而形成读者共识的。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曾云: “文章如精金美玉, 经百炼历万选而后见。今观昔人所选, 虽互有得失, 至其尽善极美, 则所谓凤凰芝草, 人人皆以为瑞, 阅数千百

年几千万人而莫有异议焉。如李太白《远别离》《蜀道难》杜子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新婚别》《兵车行》终日诵之不厌也。”<sup>[1](P1387)</sup> 这段话, 是对名篇形成及选本功用的一个准确说明。

本文拟从选本的定量分析出发, 结合诗歌入选的内外因素, 探析元和十大诗人之名篇构成及其对诗人作品整体传受效果的影响。

### 一、关于元和十大诗人名篇的数据统计

一般而言, 所谓名篇应是千百年来古今选本共同选择的结果, 大凡那些频繁入选各种选本的诗作最有理由成为被读者传诵的名篇。就古今选本在名篇形成方面之权重来说, 早期选本的选择对后来者具有显在的导向性和影响力, 其重要性毋庸讳言; 而从时效性、传播范围来说, 现当代选本对读者的引导作用也不容忽视。因而, 我们依据实际, 综合去取, 选择收录元和诗歌的古代重要选本 24 种(其中晚唐选本 2 种、宋元选本 8 种、明清选本 14 种),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和诗歌双向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01BZW 018)

合入现代通行的 22 种唐诗选本<sup>①</sup>, 共 46 种, 进行统计分析。同时, 依据名篇拥有量最少者的下限, 将入选 10 次作为界定名篇的基本标准, 制订如下表格:

表 1 古今代表性选本收录元和十大诗人篇目统计

篇名 作者	入选 10 次以上诗作篇名及选次	名篇数量
韩愈	《山石》(七古) 18 次、《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七律) 17 次、《听颖师弹琴》(七古) 15 次、《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七绝) 14 次、《晚春》(七绝) 11 次、《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七古) 11 次、《秋怀诗》(五古) 10 次、《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七绝) 10 次、《雉带箭》(七古) 10 次、《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七古) 10 次	10 首
孟郊	《游子吟》(五古) 23 次、《古别离》(五绝) 18 次、《游终南山》(五古) 11 次	3 首
李贺	《南园》(七绝) 22 次、《李凭箜篌引》(七古) 18 次、《金铜仙人辞汉歌》(七古) 18 次、《雁门太守行》(七古) 17 次、《马诗》(五绝) 18 次、《感讽》(五古) 13 次、《梦天》(七古) 13 次、《浩歌》(七古) 12 次、《昌谷北园新笋》(七绝) 12 次	9 首
贾岛	《渡桑乾》(七绝) 19 次、《寻隐者不遇》(五绝) 18 次、《题李凝幽居》(五律) 16 次、《忆江上吴处士》(五律) 14 次、《剑客》(五绝) 14 次、《三月晦日赠刘评事》(七绝) 11 次、《寄韩潮州愈》(七律) 11 次	7 首
白居易	《赋得古原草送别》(五律) 25 次、《琵琶行》(七古) 20 次、《钱塘湖春行》(七律) 19 次、《暮江吟》(七绝) 19 次、《长恨歌》(七古) 17 次、《问刘十九》(五绝) 15 次、《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七绝) 14 次、《后宫词》(七绝) 13 次、《卖炭翁》(七古) 12 次、《王昭君》(七绝) 11 次、《买花》(五古) 11 次、《竹枝词》(七绝) 10 次、《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七律) 10 次	13 首
元稹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七绝) 23 次、《行宫》(五绝) 22 次、《遣悲怀》(七律) 15 次、《连昌宫词》(七古) 13 次	4 首
张籍	《秋思》(七绝) 23 次、《节妇吟》(七古) 14 次、《凉州词》(七绝) 14 次、《野老歌》(七古) 13 次、《蓟北旅思》(五律) 12 次、《送蜀客》(七绝) 11 次、《牧童词》(七古) 11 次、《夜到渔家》(五律) 10 次	8 首

①晚唐 2 种: 韦庄《又玄集》、韦毅《才调集》均为《唐人选唐诗》(十种)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宋元 8 种: 南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南宋赵师秀《众妙集》, 四库全书本; 南宋谢枋得《千家诗》,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 南宋赵蕃、韩流《章泉涧泉二先生选唐人绝句》, 谢叠山先生评注四种合刻本; 南宋周弼《三体唐诗》, 四库全书本; 金代元好问《唐诗鼓吹》, 上海文明书局民国八年印; 元代方回《瀛奎律髓》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汇评本; 元代杨士弘《唐音》,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明清 14 种: 明高棅《唐诗品汇》,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明李攀龙《唐诗选》, 四库全书本; 明唐汝询《唐诗解》, 河北大学出版社, 王振汉点校本; 明钟惺、谭元春《唐诗归》, 明万历三色套印本; 明陆时雍《唐诗镜》, 四库全书本; 清王夫之《唐诗评选》,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清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 四库全书本;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清金圣叹《选批唐诗》,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清王尧衢《唐诗合解》,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笺注本; 清刘文蔚《唐诗合选》,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清杜紫纶、杜诒毅《中晚唐诗叩弹集》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4 年版; 清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清王闿运《王闿运手批唐诗选》, 上海古籍, 1989 年版。所选 22 种现代诗歌选本 (以出版时间排序) 为: (1)《古诗今选》, 沈祖棻、程千帆选注, 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979 年版。(2)《新选唐诗三百首》, 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3)《唐人绝句精华》刘永济选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4)《唐诗选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室唐诗选注小组, 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版。(5)《唐诗鉴赏辞典》, 萧涤非等撰稿,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年版。(6)《唐诗今译》, 徐放,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3 年版。(7)《唐诗译赏》, 杨钟岫编, 重庆出版社, 1983 年版。(8)《唐人绝句选》, 黄肃秋选, 陈新注,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9)《千首唐人绝句》, 富寿荪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10)《闻一多选唐诗》, 张志浩、俞润泉注, 岳麓书社, 1986 年版。(11)《新编唐诗三百首》, 何严、羊春秋、龙连安编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12)《唐诗精华》, 林家英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13)《唐诗精品》, 霍松林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14)《唐诗绝句精华》, 岳希仁编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15)《唐诗一百首》, 赵昌平、丁如明注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16)《唐诗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版。(17)《唐宋诗举要》, 高步瀛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18)《唐诗选》, 马茂元选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19)《唐诗精品 99 首》, 傅明伟、李玉强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20)《唐人律诗精华》, 林东海选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年版。(21)《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朱东润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22)《唐宋诗选》, 乔力主编,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

续表 1

篇名 作者	入选 10 次以上诗作篇名及选次	名篇数量
王建	《新嫁娘词》(五绝) 18 次、《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七绝) 17 次、《宫词》(七绝) 15 次、《羽林行》(七古) 13 次、《田家行》(七古) 10 次、《雨过山村》(七绝) 10 次、《望夫石》(七古) 10 次、《金陵使至汝州》(七绝) 10 次	8 首
柳宗元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七律) 28 次、《江雪》(五绝) 28 次、《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七绝) 22 次、《别舍弟宗一》(七律) 19 次、《柳州二月榕叶尽落偶题》(七绝) 19 次、《渔翁》(七古) 19 次、《南涧中题》(五古) 15 次、《田家》(五古) 14 次、《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七绝) 14 次、《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五古) 11 次、《溪居》(五古) 11 次、《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五古) 10 次	12 首
刘禹锡	《乌衣巷》(七绝) 32 次、《石头城》(七绝) 29 次、《竹枝词》(七绝) 26 次、《杨柳枝词》(七绝) 24 次、《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七绝) 21 次、《再游玄都观》(七绝) 21 次、《西塞山怀古》(七律) 21 次、《浪淘沙词》(七绝) 19 次、《松滋渡望峡中》(七律) 15 次、《踏歌词》(七绝) 14 次、《听旧宫中乐人穆氏唱歌》(七绝) 14 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七律) 14 次、《秋风引》(五绝) 13 次、《与歌者何戡》(七绝) 12 次、《堤上行》(七绝) 12 次、《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七律) 10 次、《秋词》(七绝) 10 次	17 首

据表 1 中所列 46 种选本收诗情况可知,元和十大诗人共有 91 首诗作入选 10 次以上,跻身名篇之列。若以各人拥有名篇之多寡排序,则刘禹锡最多,达 17 首;其下依次为白居易(13 首)、柳宗元(12 首)、韩愈(10 首)、李贺(9 首)、张籍、王建(各 8 首)、贾岛(7 首)、元稹(4 首)、孟郊(3 首)。就诗人群体而言,倘若将刘禹锡、柳宗元这两位“二十年来万事同”的诗人视为一组,则其名篇数最

多,两人即达 29 首;其次为元白诗派,四人共 33 首;最后为韩孟诗派,四人共 29 首。这样一个数据和顺序,已大致反映出元和诗歌具体篇章在后世受重视的程度。

由此再进一步,还可将上述各诗人名篇数在其诗篇总数中所占比率作一统计,以从别一角度了解不同诗人在名篇之单位占有率方面的情况:

表 2 元和十大诗人名篇在其存诗总数中所占比率

作 者 篇 数	韩愈	孟郊	李贺	贾岛	白居易	元稹	张籍	王建	柳宗元	刘禹锡	合计
名篇数	10	3	9	7	13	4	8	8	12	17	91
存诗总数	412	509	243	400	2884	836	485	539	164	816	7288
百分比	2.43	0.59	3.7	1.75	0.45	0.48	1.65	1.48	7.32	2.08	1.25

据表 2 所示,似可得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其一,十大诗人名篇数(91 首)占其存诗总数(7288 首)的 1.25%。这既是名篇单位占有率的总数,也是一个基数,以此基数为界,可以了解各诗人之名篇单位占有率的情形。在十大诗人中,柳宗元所占比率最高,达 7.32%,其下依次为李贺(3.7%)、韩愈(2.43%)、刘禹锡(2.08%)、贾岛(1.75%)、张籍(1.65%)、王建(1.48%),这七位诗人均超过了 1.25% 的基数;至于孟郊(0.59%)、元稹(0.48%)、白居易(0.45%),则都在基数之下,属于名篇单位占有率之较低者。

其二,在后世的唐诗选本中,诗人名篇的单位

占有率与其存诗总数一般是成反比例的。也就是说,存诗数越多,名篇的单位占有率越少;存诗数越少,名篇的单位占有率越多。这种情况,正像钱钟书《宋诗选注·序》所谓:“在一切诗选里,老是小家占尽便宜,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因为他们只有这点点好东西,可以一股脑儿陈列在橱窗里,读者看了会无限神往,不知道他们的样品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sup>[2] (P26)</sup> 由此而言,仅仅依据名篇之单位占有率,似还不足以说明诗人创作质量的高下优劣和后世选家的接受态度。

其三,尽管存在如上情况,也不能完全忽视名篇单位占有率的意义,尤其是在存诗量大致相当的

作者那里,名篇的单位占有率便成了考查不同诗人创作质量和选家接受态度的一个重要依据。如表2中的韩愈(412)、贾岛(400)乃至张籍(485)、孟郊(509)、王建(539)诸人因存诗数相差不远,便具有了大致的可比性,而韩愈2.43%的名篇比率也就处于领先的地位;又如元稹(836)和刘禹锡(816),存诗数略同,但在名篇的单位占有率上,刘氏(2.08%)领先元氏(0.48%)约4倍有余,其间的高下应是不难分辨的。

## 二、成就名篇的内外部因素分析

根据上文的统计结果,我们要提出的首要问题就是:从创作数量上讲,元和十大诗人都属于多产和高产层作家<sup>①</sup>,除柳宗元、李贺分别存诗164首和243首,属较少者外,其余均在400首以上,白居易甚至达到2884首,是唐代诗人中存诗最多的作家;从选本的择录标准来看,从晚唐至今,时代几经变迁,诗坛风气历经生新转化,各个选家的美学趣尚和选诗动机亦颇有不同。那么,在诗人众多的作品中,为什么表1所列篇目独能得到选家共同的青睐?或者说,是什么因素成就了这些选本中的名篇?

名篇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讲,一首诗歌知名度的高低大约与内外两大因素相关。内在因素是:其所表现的主题和情感能否获得读者广泛的心理共鸣,其语言、意境、风格等是否具有较高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外在因素是:与之相关的评论及评论者身份地位的高下,与作品相关的奇闻轶事、和作或拟作数量的多寡、在选本中入选率的高低及所入选本传播能力的大小等等。其中,内在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外在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小视。在不少情况下,一首诗歌能否广为人知,反倒与诗歌传播中的外部因素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

从内部因素看,前述名篇的形成大概与以下几个方面相关:

1 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典型地代表了诗人创作的个性风格和独特成就。如韩愈的《秋怀诗》奇崛清峭、寄兴悠远,《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汲取了散文的艺术写法,是其以文为诗的典范。孟郊的《游终南山》硬语盘空、险语惊人;李贺

的《金铜仙人辞汉歌》《雁门太守行》《浩歌》浓墨重彩、凄艳奇诡;柳宗元的《田家》简古淡泊、意深情苦。所有这些,都较能代表其个性风格。另如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卖炭翁》《买花》,张籍、王建的乐府《节妇吟》《野老歌》《羽林行》《田家行》,以及刘禹锡的《竹枝词》等民歌体乐府诗,亦无不体现了他们的艺术独创。

2 情感真挚质朴,具有冲击力,令人一读之下即受到心灵的震撼。如孟郊的《游子吟》虽寥寥数语,却道出人人意中所有而笔下所无的母子情爱;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别舍弟宗一》,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元稹《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诸作,或写迁谪之悲,或写沦落之感,或寄悯友之意,均情深意挚,笔力厚重,最易唤起读者的某种生命感怀。而元稹的《遣悲怀》三首,反复抒写亡妇之痛,至被衢塘退士誉为:“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sup>[3] (P19)</sup>其所看重的,也正是其浅近词语中所内蕴的情感力量。

3 清新自然、富于神韵的绝句容易入选。从艺术风貌上讲,前表中某些名篇或许不能完全体现诗人的创作个性,但由于其神韵天然、琅琅上口,仍受到选家的共同赏爱。如韩愈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晚春》,孟郊的《古别离》,贾岛的《寻隐者不遇》,白居易的《暮江吟》,王建的《新嫁娘词》,刘禹锡的《秋风引》,皆随口而成,语言晓畅,格调清新,情思真切而兴味悠远。

4 题材独特、艺术精妙的诗歌也容易吸引选家的关注。如兼具乐曲与诗歌双重美感特质的琴诗,以上名篇中就有韩愈《听颖师弹琴》,白居易《琵琶行》,李贺《李凭箜篌引》三篇,它们各有特色而异调同工,摹声传情。又如李贺的《马诗》,王建的《宫词》,刘禹锡的《竹枝词》《浪淘沙词》等,其所以受到选家的关注,也与这些诗作在表现题材上的创新性以及用组诗形式联章而下等形式特点有关。

倘从外部因素看,也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要点:

1 诗歌背后存在本事或逸事,这些故事在后世广为流传,直接促成了诗歌的声名。如贾岛的《题李凝幽居》,其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句就有著名的“推敲”典故。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sup>①</sup>依据唐代诗人之存诗量,我们将存诗500首以上者,视为高产层;存诗100首至500首之间者,视为多产层;存诗20首至100首之间者,视为中产层;存诗20首以下者,视为低产层。(参见尚永亮:《唐代诗歌的多元观照》,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

春风吹又生”，亦伴随着顾况“米价方贵，居亦弗易”、“道得个语，居即易矣”之品评的逸事。它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刘禹锡《白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频繁入选，除诗歌艺术高妙外，恐怕还与其所描述之帝王与后妃的恋情故事以及刘韩二人因政治言行被贬的独特遭遇密切相关。

2 文坛名家的赏爱和推崇，激扬了诗歌声价，从而某种程度上赢得了选家的重视。如李贺的《雁门太守行》《唐摭言》谓曾得韩愈激赏，束带出门，邀与相见。韩愈的《山石》诗，先被苏轼称赏：“萃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谁。宿云解驳晨光漏，独见山红涧碧时”<sup>[4](P1614)</sup>，继被元好问拿来与秦观诗对比品评：“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sup>[5](P332)</sup>从而极大地凸显了韩诗萃确硬朗的特点。至于《听颖师弹琴》的高频率入选，既在于其摹写琴声之高妙，也与宋代两大文坛巨匠欧阳修、苏轼关于该诗是琴诗还是琵琶诗的争议及苏之仿作有关<sup>①</sup>。

3 《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少数几种极具影响力的选本，对名篇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如果从选录动机出发，可将唐诗选本约略分为三种：一是选家借选本突出自己的诗歌观点，为自己的门派张目；二是出于个人的审美趣味而选辑，有自娱自赏的因素；三是向大众普及的一般选本，尤其是一些童蒙读物。就诗史研究而言，这三类选本各有其意义，但从传播效果看，前两种选本因拘于一家之见，选诗标准难免流于偏颇，时过境迁，易为不同趣好者取代，影响力大打折扣；而童蒙读物大多立场客观，选取浅显易懂而又雅俗共赏的诗篇，故其传播力要大得多。《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蘅塘退士孙洙在序言中说：“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即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唐诗三百首》的编选意义，孙洙亦有说明：“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sup>[3](P3)</sup>此语道出了一个规律，那就是人

们童年时期所诵读的诗歌，会在一生中牢牢占据内心深处，不断滋养心灵的诗意。由此可见此类选本对于读者接受的重要性。当然，无论是《千家诗》还是《唐诗三百首》其实际的传播效果早已远远超出了编者最初的主观动机，而成为了雅俗共赏的大众读物，它们对民众文学素质的提高，对民族诗歌审美心理的形成，都有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所以即使在表 1 所列名篇之内，也存在着知名度大小的差异。如韩愈《左迁蓝关示侄孙湘》《晚春》《山石》三诗分别入选《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其知名度显然比《听颖师弹琴》《秋怀诗》《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等篇大得多；孟郊的《游子吟》和《古别离》的入选次数相近，但后者未入《唐诗三百首》二者的知名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以上主要是从诗歌特点和选本传播因素来分析名篇的形成。相比之下，一首诗歌之所以能成为名篇，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它的内在文学特质，选本的选录只是起到了加速传播、扩大影响的催化作用。同时，读者的接受取向和审美心理也不可忽视。仍以孟郊《游子吟》为例，该诗以简洁的语言对世间至高至纯的母爱进行了热情的赞颂，因而在千百年无数读者中产生深深的共鸣。1992年香港举办“最受欢迎的唐诗选举”，此诗即名列榜首<sup>[6]</sup>。除此诗外，《唐诗三百首》还选了孟郊的《列女操》一诗，二诗同为赞美亲情伦理之作，但接受效果却天壤有别。可见，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再选择，其意义有时要大于诗歌文本的原始意义和选家的主观选录动机。

### 三、名篇与诗体之关系

名篇之形成，除与诗歌内外诸因素的综合作用相关外，还与诗体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前面的分析已简略谈到诗体特别是绝句一体在名篇形成中的作用，若将表 1 所列名篇按诗歌体制分类统计，则会对不同诗体在名篇中所占比例获得更清楚的了解。

<sup>①</sup>苏轼《欧阳公论琴诗》“欧阳文忠公尝问仆：‘琴诗何者最佳？’余以此（按：指韩《听颖师弹琴》）诗答之，公言此诗固奇丽，然自是听琵琶诗，非琴诗。余退而作《听杭僧惟贤琴》诗云：‘大弦春温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门前剥啄谁扣门，山僧未闲君勿嗔。归家且觅千斛水，净洗从前筝笛耳。’诗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为恨。”（《苏轼文集》卷七十一《杂书琴事十首赠陈季常》之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243 页）苏轼《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前有序记此事云：“欧阳文忠公尝问余：‘琴诗何者最善？’答以退之《听颖师琴》诗。公曰：‘此诗固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诗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隳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东坡乐府》，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 页）

表 3 元和十大诗人名篇诗体分布表

诗 体 作 家	诗体						数量
	七古	五古	七律	五律	七绝	五绝	
韩愈	5	1	1	0	3	0	10
孟郊	0	2	0	0	0	1	3
李贺	5	1	0	0	2	1	9
贾岛	0	0	1	2	2	2	7
白居易	3	1	2	1	5	1	13
元稹	1	0	1	0	1	1	4
张籍	3	0	0	2	3	0	8
王建	3	0	0	0	4	1	8
柳宗元	1	5	2	0	3	1	12
刘禹锡	0	0	4	0	12	1	17
	21	10	11	5	35	9	91

表 3 显示,在从古今 46 种选本筛选出来的 91 篇名作中,七绝占绝对优势,达 35 篇;如果加上五绝 9 首,绝句即有 44 篇,其所占比例接近名篇总数的 50%。而就绝句名篇个人占有量来看,刘禹锡多达 13 首,稳居十大诗人榜首;其次为白居易,共 6 首;再次为王建,共 5 首,贾岛、柳宗元各 4 首。此外,在十大诗人中,除了孟郊这一特例外(其本身较少染指于近体诗创作),几乎所有诗人都有七绝入选。由此可见,在选本这一诗歌传播载体中,绝句尤其是七绝最受欢迎。

七绝之后,排名占第二位的诗体便是七言古诗了,多达 21 首。而就个人占有量来看,韩愈、李贺各 5 首,并列前茅;其次为白居易、张籍、王建,各 3 首。这种情况说明:在中唐元和诗坛,虽然近体诗创作已颇为流行,但由于韩愈、李贺等人倾力于古诗创作,元白张王等多作乐府,从而使得其七古创作成绩大为可观,为人瞩目。

此外,七律(11 首)、五古(10 首)等诗体在名篇数量上虽不及七绝和七古,但也有不容忽视的代表作家。如七律之刘禹锡(4 首)、五古之柳宗元(5 首),均为该诗体中名篇数最多的诗人,而且从文学史实际看,这些诗体,也较能代表其创作特点。

为更深入探讨名篇形成之原因,我们再将表 1 所列十大诗人所有名篇,按其入选次数,将排名前十位的篇目拈出,制成下表:

表 4 元和十大诗人前十篇名作序列表

作者	篇名	诗体	选次	排名
刘禹锡	《乌衣巷》	七绝	32	1
刘禹锡	《石头城》	七绝	29	2
柳宗元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七律	28	3
柳宗元	《江雪》	五绝	28	3
刘禹锡	《竹枝词》	七绝	26	4
白居易	《赋得古原草送别》	五律	25	5
刘禹锡	《杨柳枝词》	七绝	24	6
张籍	《秋思》	七绝	23	7
孟郊	《游子吟》	五古	23	7
元稹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七绝	23	7
柳宗元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七绝	22	8
元稹	《行宫》	五绝	22	8
李贺	《南园》	七绝	22	8
刘禹锡	《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七绝	21	9
刘禹锡	《再游玄都观》	七绝	21	9
刘禹锡	《西塞山怀古》	七律	21	9
白居易	《琵琶行》	七古	20	10

由于部分篇目选次相同,所以表中前十位的名篇实得 17 首。其中刘禹锡独占 7 篇,他如柳宗元 3 篇,白居易 2 篇,元稹 2 篇,张籍、孟郊、李贺各 1 篇,而历来公认的元和诗坛大家韩愈则无一篇,王建、贾岛亦落选。进一步看,在这 17 篇作品中,七言绝句 10 篇,五言绝句、七律各 2 篇,五律、七古、五古各 1 篇。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短小精当的绝句体最受选家和读者青睐,而在绝句体中,七绝因其字数的增多和音调的起伏流转,又胜过五绝。大凡绝句作得好的诗人,在选家和读者视野中便占得了先机。刘禹锡、柳宗元的部分诗篇在选本中最受欢迎,其原因之一即为二人入选者多是绝句(刘之 7 首中 6 首为七绝,柳之 3 首中五绝、七绝各占 1 首),白、元、张、孟、李诸人之 7 篇名作中,绝句占了 4 篇,其情形与刘、柳大致相同。当然,除了绝句体裁的优势,亦因这些诗作均具很高的艺术水准,其经典性在长期的传受过程中已得到公认。至于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琵琶行》二诗,虽为五律和七古,却因其特殊本事和高度艺术性而在白氏生前身后获得极广泛的流传;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孟郊的《游子吟》、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二为七律,一为五古,其进入前十,盖因诗人本身遭遇、题材和表现亲子情感的关系,而屡受选家和读者追捧。

至于韩愈,身为大家,却无一首进入名篇前十序列。考其原因,约有数端:一为韩诗不以绝句擅长,所作多为古体;二为韩愈虽为大家,但其代表性诗歌多为生新怪奇之作,其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及以俗为美、以丑为美的诗歌追求,未必广受大众喜爱。韩诗在诗史上的创新性、开拓性与广大读者视野中的可读性、经典性是有出入的。换言之,具有创新性、诗史地位高的诗人,其传播人口的名篇未必就多;而创新性不是那么强、诗史地位也不是那么高的诗人,未必缺少脍炙人口的佳作。在名篇多寡与诗人成就、地位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正比例关系。

## 四、余 论

既然如前所述,名篇之形成与该作品之内外因素相关,并一定程度上依赖诗人所选用之诗体,那么,表 1 或表 4 所列诸名篇是否就能代表该诗人的创作风格呢?回答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其一,这些名篇的形成不是由某一选本决定的,而是由其

在历代众多选本中的多次入选决定的,这就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个别选家眼光不济可能出现的偏颇;其二,每位诗人的名篇不是一首,而是若干,这就易于通过互补大致致动态平衡,大体保证这些名篇所具有的经典性和代表性。

当然,就选本与名篇的关系而言,也还有可辨者在。如果说,通过相互平衡、补充,从古今 46 种选本筛选出来的上述名篇尚能大致代表各诗人的创作风格,那么,就单个选本而言,就不尽然了。由于选本大多篇幅有限,所选诗歌难以涵盖诗人作品全貌,因此有时难免误导读者将少数名篇特色理解为诗人整体诗风。一般而言,名篇的形成与选本传播的时空范围有重要关系,而制约选本传播之时空范围的一个因素便是其选诗数量。倘若卷帙过繁,便不易使读者在有限时间内轻松读完;倘若篇目太少,又不免有遗珠之憾,降低了选本的价值。在历代著名诗歌选本中,《千家诗》共选诗 226 篇<sup>①</sup>,《唐诗三百首》313 篇,《唐诗合选》368 篇,近年来也有各种层出不穷的“一百首”、“三百首”系列选本,这都说明,诗歌选本选诗量 100 首到 300 首左右,较易于在大众中传播。但这样一来,每位诗人被选入的诗篇就十分有限了。在大诗人成百上千首多姿多彩的诗歌中,也就很难选出完全富有代表性的篇目。如果说《唐诗三百首》中所选韩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石鼓歌》四首诗尚可代表韩诗主要特色,那么孟郊的《游子吟》、贾岛的《寻隐者不遇》便较难代表孟、贾寒枯瘦硬的主体诗风了。所以,名篇对诗人来说也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名篇的形成对诗人声名传播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人以诗名,其诗不在量多而在名大;但另一方面,部分名篇也会对诗人整体诗歌的传受形成负面影响,以致遮蔽其主体风貌,给读者造成单一化的印象。在审视元和十大诗人上述名篇时,我们也应注意这方面的情况。

### 【参考文献】

- [1] 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 [A].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 钱钟书. 宋诗选注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 [3] 蘅塘退士. 唐诗三百首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4] 王文诰, 孔凡礼. 苏轼诗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5] 元好问, 施国祁. 元遗山诗集笺注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 [6] 金开诚. 漫谈香港的“唐诗选举” [J]. 群言, 1993 (1).

[责任编辑:戴庆璋]

<sup>①</sup>此为《千家诗》的选诗总数,其中唐诗 144 首,宋诗 82 首。